

从各个领域研究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经验教训的总结

李 捷

(《求是》杂志社, 北京 100727)

〔摘要〕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一股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风潮面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顶住了这股逆流,澄清了是非,稳住了阵脚,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娴熟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分为二地分析了斯大林的功绩与错误,分析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与教训,并且以此为鉴戒,开始了独立自主地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出现了勃勃生机。

〔关键词〕 毛泽东; 苏联; 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总结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999(2016)05-0001-09

—

1956年,既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实现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步之年。在这一年中,发生了一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深思考。这就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斯大林评价问题的提出。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一股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风潮面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为其所动,而且旗帜鲜明地顶住了这股逆流,澄清了是非,稳住了阵脚,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娴熟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分为二地分析了斯大林的功绩与错误,分析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与教训,并且以此为鉴戒,开始了独立自主地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出现了勃勃生机。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苏共在斯大林逝世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期间,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面批判斯大林。不久,这个报告在西方世界披露出来,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

同年6月和10月,波兰和匈牙利相继发生严重的政治事件。苏共中央准备对波兰动用武力,赫鲁晓夫飞抵华沙的同一天,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递交了信件,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讨论波兰问题的社会主义国家会议。在同尤金的会见中,毛泽东表示:如果苏联不动用武力,也不召

〔收稿日期〕 2016-06-20

〔作者简介〕 李 捷(1955-)男,山东平阴人,《求是》杂志社社长,博士生导师。

开国际会议谴责波兰，而同意用和平方式解决苏波分歧，中共同意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和苏共商谈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天，毛泽东还约见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把这个答复通报给了波兰领导人。⁽¹⁾

10月21日、22日晚，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通知。在听取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介绍外国通讯社有关波兰情况的介绍后，毛泽东指出：苏联准备对波兰进行武装干涉违反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会议认为，在目前这种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向苏共中央发出严重警告，坚决反对苏联对波兰采取武装干涉。²³日凌晨，毛泽东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陪同，紧急约见苏联大使尤金。毛泽东严厉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这样做。如果不听劝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

接受苏共中央的邀请，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于10月23日前往莫斯科同苏共中央领导人会谈，刘少奇向苏共中央领导人转达了毛泽东关于苏联同东欧各国关系的建议：对东欧各国政治经济上放手，让他们自己去搞；在军事上，征求他们的意见，问他们是否要华约，是否要驻军，或者是要华约但苏联撤军，敌人进攻时再去。赫鲁晓夫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²⁾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过去的错误，表示了改善相互关系的愿望。1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了支持苏联政府声明的声明。

苏共二十大以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和社会上一部分人强烈要求改变现行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要求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在斯大林时期所犯错误进行彻底清算，要求摆脱苏联的控制争取独立自主，引发了匈牙利党内的严重分歧。10月23日，布达佩斯街头出现了示威游行的群众队伍，其后游行队伍占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一些机关，发生同保安部队的冲突，造成了流血事件，事态越演越烈，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及政府逐渐失去对局势控制的能力。

苏共中央向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表示，苏共中央对此态势已经绝望，准备从匈牙利撤出军队。刘少奇召集中共代表团成员紧急讨论应对方案并在电话中向北京作了请示汇报。在当天晚上举行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提出反对苏军撤出匈牙利，认为在现在这种局势下苏军撤出匈牙利，将其交给使用暴力手段的反政府势力是不妥当的。苏共中央采纳了中共代表团的意见。10月31日晚，在莫斯科机场为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送行时，赫鲁晓夫告诉刘少奇，苏共中央经过开会研究，已经决定在匈牙利采取进攻方针，尽全力挽救匈牙利的局势。

11月1日，毛泽东连夜听取刘少奇就波匈事件和苏共中央的处理情况作详细汇报。第二天，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听取刘少奇等人的汇报，并对东欧局势进行讨论。

应当说，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问题上，通过波兰事件，中共赢得了兄弟党的尊重。这是长期处于“老大哥”中心地位的苏联领导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但从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起，直到匈牙利事件被平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整个1956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毛泽东将这一年称作“多事之秋”。

二

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变动，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等问题得到揭露，忧的是列宁主义的地位受到削弱。毛泽东曾经说“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到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³⁾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犯错误的思想根源，首先是主观认识脱离了客观实际。1956年8月30日，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我们看到的批评斯大林错误的许多文章，就是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或者很少提到这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⁴⁾

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斯大林在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

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5〕}

在正确指出斯大林错误的同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等过分指责斯大林的所谓“个人品质”问题，进而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做法，也深感忧虑。他多次强调，对斯大林要三七开。苏联发生的错误，包括斯大林的错误，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是可以纠正的。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重申“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6〕}

毛泽东的上述论述，对于解放思想、稳定人心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了在大是大非面前及时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态度，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以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且说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有着深刻的含义。西方政界人士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其反响中，认为已看到在共产主义“铁幕”后面的裂缝，从而积极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企图使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他们的许多活动都是在所谓“反斯大林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和迷惑性。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少领导人对此缺乏应有的警惕，对斯大林的错误又缺少正确的分析，简单地批判“斯大林主义”。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势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特别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上造成混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有必要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

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和毛泽东在起草过程中所作的修改，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思想。这些重要思想，既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初步探索的开端。

（一）第一次提出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命题

这是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的。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首先有一个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1956年4月初，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①

针对苏共二十大以后西方敌对势力乘机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中共中央指出，从基本原理上来说，十月革命道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 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因此，“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7〕}。同时，鉴于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中共中央又指出，现在我们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毛泽东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8〕}也就是说，

① 转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毛泽东从自身的实践和斯大林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中体会到一个真理：马克思主义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他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我们党内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⁹⁾

（二）正确评价斯大林的是非功过，实事求是地对待共产党人所犯错误和工作中的失误

关于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在审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加写或改写了这样几段话“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他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中所以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样做。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¹⁰⁾他的错误，主要的是“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¹¹⁾。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功绩也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在文中论述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的一段文字之后，毛泽东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的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¹²⁾在其他有关段落中，毛泽东还加写了这样几段“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凡是他的著作中有益的东西，“我们都需要当做一项重要的历史遗产接受过来”⁽¹³⁾。

毛泽东指出“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¹⁴⁾历史常有相似之处。其中之一，就是骄傲必犯错误。文章实事求是地指出“当着斯大林正确地运用列宁主义的路线而在国内外人民中获得很高的荣誉的时候，他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把他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结果也就使自己的某些行动和自己原来所宣传的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处于相对立的地位。”⁽¹⁵⁾

对斯大林这样一个成就巨大、错误也巨大的历史人物究竟如何评价，这不是个小问题。毛泽东强调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¹⁶⁾

毛泽东从更高的高度来思考斯大林犯错误的历史必然性，并由此联想到中国共产党自身。他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指出“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这样伟大艰巨的事业，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因为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前无古人的道路。”⁽¹⁷⁾他还提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即要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¹⁸⁾。

(三) 鉴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斯大林问题的教训,及时提出建立一定的制度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防止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现象发生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教训作了深入的分析,指出斯大林错误的思想和理论根源,在于“使自己的某些行动和自己原来所宣传的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处于相对立的地位。一方面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承认党必须永远地联系群众,必须发展党内民主,发展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另一方面却又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使得斯大林后一时期在这个问题上陷于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矛盾”^{〔19〕}。

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防止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类现象还是会长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再出现。有时由这一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人们在注意到个人作用的时候,常常会看不见群众和集体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就很容易犯出狂妄自大、迷信自己、或者盲目崇拜别人的错误。因此,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20〕}同时,毛泽东也提醒人们注意问题的另一方面,不要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党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而领导人民群众的先进人物。否认个人的作用,否认先进人物和领导人物的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21〕}

个人崇拜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封建主义的浓厚色彩,是和社会主义根本不相容的。但是,为什么这种现象又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思想,并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个人和集体的矛盾现象,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而任何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如果脱离集体领导,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实际生活,他们就必然会使自己的思想硬化起来,以致做出严重的错误。对于我们必须警惕的,就是:有些人当他们因为党和国家有了很多工作成绩,取得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的时候,便有可能利用这种群众的信任去滥用权威,做出一些错事来”^{〔22〕}。

怎样根除个人崇拜呢?毛泽东再次倡导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并从制度上加以保证,以防止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的现象发生。他提出“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23〕}在谈到中国共产党人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的经验时,他还指出,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依靠民主集中制,依靠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这些思想,在中共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和发挥。

(四) 根据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初步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毛泽东批评了那种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再有矛盾存在的观点,指出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的。他指出“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远得多少倍。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一切都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有些人认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中消除掉,这个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只要还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还存在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那末,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还将存在,还将经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24〕}

在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时,毛泽东改写了这样一段话“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若干年来,我们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中有了些成绩,但是一般说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状态存在着。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

影响。”⁽²⁵⁾

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把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失误和挫折，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样的高度来分析和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从以上这些论述看，毛泽东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相继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绝不是偶然的。这些思想都是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并且正确地吸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其中也包括斯大林问题的教训。

三

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的思考，并没有到此为止。随着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恶果的日益显露，1956 年 12 月，毛泽东又主持起草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1956 年夏秋之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恶果日益显露出来。西方政界人士借机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出现一股右倾思潮。波匈事件发生后，在社会主义各国引起不同反响。有人把它归咎于斯大林主义，提出“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

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再次引起毛泽东的警觉。1956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里，进一步指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危害性。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被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丢了，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人，反所谓斯大林主义。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出来耍了一顿。他还认为，列宁这把刀子，也被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丢掉相当多了。因此有必要在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途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进一步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

1956 年 12 月 29 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发表前，毛泽东作过多次修改，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这篇文章紧紧围绕以下四个问题，进一步阐明了一些重要理论观点。

（一）进一步强调要正确总结和坚持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基本经验

文章对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作了初步概括，认为这些经验“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文章指出，苏联也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在这里，毛泽东特地加上一段话“错误和失败，尽管在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上有不同，却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不能完全避免的。”⁽²⁶⁾

怎么看苏联经验呢？文章强调的仍然是实事求是的分析方法，指出“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它们的国际意义说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在苏联的成功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另一部分不具有这种普遍意义。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错误和失败，尽管在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上有不同，却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不能完全避免的。”⁽²⁷⁾这里又提出一个问题，怎样看待苏联道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文章指出“每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除了有共同的方面，还有不同的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具体的发展道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去讨论。但是从基本原理上说来，十月革命的道路却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这不但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尽管我国的革命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可是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²⁸⁾

（二）全面评价斯大林的是非功过的问题，指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严重后果

在谈到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时，文章着重分析了斯大林的错误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关系，批驳了一些错误观点。文章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想用斯大林的错误来证明社会主义

制度的‘错误’，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另外有些人想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对于经济事业的管理来解释斯大林的错误，认为政府管理了经济事业就必然成为妨害社会主义力量发展的‘官僚主义机构’，这也无法令人信服。”⁽²⁹⁾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还有缺陷。斯大林犯错误时期，“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之所以会受到某种破坏，有一定的社会历史的条件。这就是：党在领导国家方面还缺乏经验；新的制度还没有巩固到足以抵抗一切旧时代影响的侵袭（新制度的巩固过程和旧影响的消失过程，都不是直线的，它们的某种波浪式的起伏现象，在历史的转变时期是屡见不鲜的）；国内外的紧张斗争对于某些民主发展所起的限制作用；等等。但是仅仅这些客观条件并不足以使犯错误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在比斯大林所处环境更加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列宁却没有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³⁰⁾。

文章还第一次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阐发了人们容易犯错误的主客观原因。文章指出“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³¹⁾

制度是具有决定性的，但是不是万能的呢？文章做出了辩证的答复：“有了适合需要的基本制度，也调整了制度中的日常性质的矛盾（按照辩证法，就是处在‘数量变化’阶段的矛盾），是否就可以保证不发生错误了呢？问题没有这样简单。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的制度，都不能保证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³²⁾

文章强调要依靠群众的力量、集体的力量来弥补领导者个人的不足，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依靠群众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调整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当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的主观认识，总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符合于客观实际。因此，在他们的工作中，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严格遵守并且努力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只要彻底遵守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只要认真地依靠群众，全国性的、长时期的、严重的错误，却是可以避免的。”⁽³³⁾“斯大林后期的一些错误之所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长期性的、严重的错误，而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正是因为他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和集体，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³⁴⁾

文章再一次肯定斯大林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倾向提出严肃的忠告“如果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把他们叫作这种分子那种分子，而加以歧视和敌视，就不但不能使自己的同志得到应有的教训，而且由于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势必在客观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的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³⁵⁾

（三）在进一步强调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鲜明地提出了坚决反对右倾思潮的问题

文章认为，由于一部分共产主义者对斯大林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另一方面，“在目前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潮流中间，在我们国内和国外，都有人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意义”。鉴于以上两种情况，文章明确提出“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³⁶⁾

文章认为，这种右倾思潮，集中地表现在对待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问题上。“由于斯大林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时期的领导者犯了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严重错误，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就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图削弱或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削弱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削弱或者否定党的领导作用。”文章指出“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界

限。”⁽³⁷⁾ 这些分析是切中要害的。文章中使用了“修正主义”这个概念，却对它的具体内容缺乏明确而恰当的界定，在以后造成了原来没有预料到的不好的后果，但是，文章对右倾思潮所作的剖析是恰如其分的。

当时在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错误态度。一种是用各国道路的特殊性来否定苏联经验的普遍意义，另一种是用苏联经验的普遍性来否定各国道路的特殊性。因此，文章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得到成功。而且只要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创造出自己的新的经验，从而给别的民族和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作出一定的贡献。教条主义者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他们不肯认真地研究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不肯根据这些特点具体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指导无产阶级的事业达到胜利。”文章还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承认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然有它的民族特点，但是这决不是说，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没有基本的共同点，可以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目前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潮流中间，在我们国内和国外，都有人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意义。”

同样，在学习苏联经验上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全盘照抄的态度，另一种是全盘否定的态度。文章指出“苏联的一切经验，包括基本的经验，都是同一定的民族特点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别的国家所不应该原样照抄的。如前所说，苏联的经验中还有错误的、失败的部分。所有这些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对于善于学习的人都是无价之宝。因为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少受损失。反之，如果不加分析地原样照抄，那么，在苏联成功了的经验也可以在别的国家造成失败，更不要说失败的经验了。”

文章敏锐地指出了当时的一种思想动向，即借口反对斯大林而否定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文章指出“由于斯大林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时期的领导者犯了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严重错误，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就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图削弱或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削弱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削弱或者否定党的领导作用。”

文章还正确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把对于反革命力量的专政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样，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如果有一种民主可以被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以被利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那么，这种所谓‘民主’就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³⁸⁾ 后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社会主义民主同人民民主专政的这种关系又作了系统的阐述。

(四) 结合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初步形成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的思想

文章中有一段经过毛泽东反复修改的文字，集中论述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思想。文章说“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文章还提出敌我矛盾在特定情况下互相转化的问题，告诫人们注意分清敌我矛盾的界限“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的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

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互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39〕}

文章还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特点，提出要及时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某些不相适应的矛盾加以调整。指出“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40〕}文章也正确地提醒人们注意问题的另一方面“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的制度，都不能保证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41〕}

正如文章的题目所揭示的那样，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所作的再一次重要探索。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雏形，同时也可以体会到毛泽东提出这一理论的深刻的国际背景。

毛泽东在认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对斯大林问题极为关注，决不是偶然的。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斯大林问题不仅仅是对个人的评价问题，而是关系到在尖锐地批评共产党领导人所犯严重错误的同时能否坚持马列主义旗帜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早就敏锐地察觉到这个问题。1956年4月29日，他在同外国友人的谈话中指出“斯大林问题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的事情，而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事情。对斯大林的错误，大家心里都不会好过。《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那篇文章是由我们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过六七次的修改才发表的。”^{〔42〕}毛泽东在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还着重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43〕}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文献，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逆流的关键时刻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而且开启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而艰辛的探索。这一历史性贡献，深深地镌刻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丰碑之上，深深地镌刻在新中国发展的历史丰碑之上。

（参考文献）

-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61—62，62。
- 〔3〕〔4〕〔5〕〔6〕〔8〕〔16〕〔23〕〔42〕〔4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70，89—90，194，42，23，20，19，65，20。
- 〔7〕〔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568，566，566，568，571，573，571，571—572，572，573，576，578—579，581、586，583，562—563，571，572。
- 〔9〕《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9。
- 〔10〕〔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61，62。
- 〔12〕〔13〕〔14〕〔15〕〔18〕〔19〕〔20〕〔21〕〔22〕〔24〕〔2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229，235，229，229，227—228，229—230，233，230，232，232，235。
- 〔17〕吴冷西。十年论战（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15。

（责任编辑：单孝虹）